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内容简介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分中国历史人口地理、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和中国历史城市地理三编，共七章，48 万字，分别叙述历代户籍制度、人口增耗、统计不实和历代确实人口数字的再估算；历代疆域、政区的变迁，清代我国疆域的最后确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历代长城的修建；长安、洛阳、开封、南京、临安、北京等故都的先后兴起及其布局规模；古代广州、扬州、宁波、泉州、上海、天津等沿海重要港口的兴替等等，并附有地图 126 幅。

本书可选用为大专院校中国历史地理课程的教材或主要参考用书，对有关研究方面都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可以作为一般图书馆和有关工作者常备的参考书、工具书。

上册为中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中国历史经济地理两编，已经出版。

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下册）

第三编 中国历史人口地理

第十章 历史时期人口的发展（上）

第一节 历史早期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的人口

一、夏、商、周三代人口的稀少

1. 早期奴隶制国家夏朝人口的稀疏

我国历史上约建立于公元前廿一世纪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据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记载：“及禹平水土，还为九州，今《禹贡》是也。是以其时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二十四顷，定垦者九百三十万六千二十四顷，不垦者千五百万二千顷。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三人”。

以考订精审著称的历代典章制度专著《通典》与《通考》，对皇甫谧所言不加置疑，全文照录。后世史家更相沿不废，直至近年一些论著中仍继续沿用。有学者将《帝王世纪》所述夏禹人口视为“世界各国最古人口数字之一”，还有人认为皇甫谧系采自《汲冢纪年》，并引《左传》“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及《尚书·尧典》“协和万国”的记载，解释“万国”为“一万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万人，即平均每个部落一千三百五十五人，从而确认《帝王世纪》所云绝对可信，并把它视为“永垂青史的历史见证”。

按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系当时学者为实现大一统的理想，假托大禹治水划分九州，并非大禹时的实际。《禹贡》作者于每州分叙其山川、湖泊、土壤、物产以至田赋等级及贡品运道等地理现象，无不纷然并陈，独不敢言及人口，及司马迁作《史记》，充分利用皇家所藏全部典籍，但有关禹的记述，亦多照录《尚书》，无所补益。晚于《禹贡》成书时代六、七百年之久的皇甫谧，又如何得知二千三百余年前大禹时的人口数呢？

皇甫谧系三国时人，卒于西晋太康三年（282年），《汲冢纪年》于其去世的前一年才出土，经卫恒、束皙译注后始得流传。皇甫谧是不可能利用到的，何况传世的汲冢书并无有关夏禹的人口记录。至于《尚书·尧典》所谓“万国”，其数字不可拘泥，正如《大誓》“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古人万、亿、兆等字寓意为众、多，不可视为实数。

夏朝统治力量所直接控制的仅限于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而《帝王世纪》所云其时垦地达9,306,024顷，甚至比《汉书·地理志》所载的疆域比传说中的九州大得多的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垦田数8,270,536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胡焕庸：《中国人口史提要》，《人口研究论文集》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左传》哀公七年。

张一凡：《关于舜禹时代的人口》，《人口研究》，1985年6期。

《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

《晋书》卷五一《束皙传》。

《左传》昭公二十四年。

顷还要多，其夸张失实已显而易见。况且刚由原始部落的松懈联盟过渡到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夏朝，在当时政治结构和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也不可能有如此甚至精确到个位数的人口与耕地统计。皇甫谧所云显系出于虚构，不可凭信。

夏代人口已无可考。当少康中兴开始依附于有虞氏时，据《左传》记载：“有田一成，有众一旅”，杜注：“方十里为成，五百人为旅”。其后少康即依靠这支军事力量，攻灭了夺取夏后氏领导地位的寒浞的两个儿子浇和豷，“复禹之绩”，可见当时人口不会很多。

夏末统治者淫乱暴虐，社会动乱迭起，“而诸侯多畔（叛）”，加上商人在东方的兴起，夏王朝被迫退居到山西南部周初称为“夏虚”的地方。史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太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其活动范围已祇限于今晋、豫、陕三省交界处的狭小地区。《帝王世纪》云：“孔甲之至桀行暴，诸侯相兼，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方于涂山，十损其七”。所谓十损其七，也只是一种蠡测之词，但说明夏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已大为缩小，最后又经历了商灭夏的战争，末期人口当更为稀少。

2. 商朝人口增长的迟缓

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商王朝建立后，随着奴隶国家的发展与强大，奴隶主统治者通过对周边各部落之间的战争掠夺奴隶和财产，卜辞中常出现“获羌”、“执羌”、“多羌”等俘获羌人的记录。在对羌人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中，曾出动兵员一万三千人。甲骨文记载：“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每师约万人，三军共三万余人。

但是商朝人口的增长率很低，卜辞中屡有“伐羌”、“伐妾”，即将奴隶用于人祭、人殉的记载。在部分已著录的甲骨文资料中，有关人祭的卜辞即达1,992条。如武丁死后“用三百羌于丁”，最多的一次有五百个奴隶用于人祭。1976年，在安阳武官村北殷王陵墓区发现的奴隶祭祀坑所埋奴隶遗骨近千具。奴隶的生命被视如草芥，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甚至经常出现负数。而商代对外战争频繁，仅武丁时期卜辞中为伐工方而占卜的记录即达三百多次，也大大影响承担兵役的自由民人口的增殖。惟有奴隶主贵族为了使自己统治长存，“万年维王”，希望“多子孙甲”，以“奉先思孝”，才重视人口的繁衍。《帝王世纪》在论及商代人口时谓：“殷因于夏，

《左传》哀公元年。

《史记》卷二《夏本纪》。

《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引《帝王世纪》。

《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310片：“辛巳卜，贞：登帚（妇）好三千，登旅万，乎伐羌”。

《殷契粹编》597。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文物》，1974年7期。

《殷契卜辞》245。

《续卜》10574：“用五百仆”。

《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尚书·梓材》。

《殷墟书契后编》卷下，一四叶一断片。

《尚书·商书·太甲中》。

六百余载，其间损益，书策不存，无以考之”。《通典》、《通考》因亦不见转录。

商期后期，统治阶级极端腐朽，“靡（莫）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为满足其高度的物质享受，不惜“坏宫室以为汗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为了勒索贡赋，“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周成王所看到的殷代社会，已是一片“麋鹿在牧，蜚鸿遍野”的景象。当“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时，竟至“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其人口的稀少更可想见。

3. 西周人口发展仍处于低水平上

建立于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是我国奴隶制逐步走向衰亡的时期。周人已较少将奴隶用于作人祭、人殉的牺牲品，并开始注意人口的蕃衍。如“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鹵，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使“人物归之，繇至而辐凑”。《诗经》“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¹¹⁾，“桃之夭夭，有蕢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¹²⁾，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子生育的鼓励和歌颂。

西周初期的人口，据《帝王世纪》记载：“及周公相成王，致治刑错，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三人，多禹十六万一千人，周之极盛也”⁽¹³⁾。《通典》记载亦同⁽¹⁴⁾。按西周建国之初，对原商朝地区的控制，仍力有不逮。周公相成王，为了巩固其统治，不得不实行“封藩建卫”，即“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还是一种较原始的部落殖民，并未形成后世那样连成一片的疆域，不可能有这样多的人口和如此周密的人口调查。

《周礼》记载西周时已建立全国人口调查的“大比”制度：“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周礼》一书，近人参照周秦铜器铭文所载官制考订，乃成书于战国时代。其所记载周王朝人口统计制度之完备，实出自后人的设想，并非西周典章制度的实录，同样不可为据。

西周初武王伐纣，有兵车三百乘，士卒四万五千人，虎贲（冲锋兵）三千人，即攻入朝歌灭商。周公时有“宗周六师”（又称“西六师”）戍守镐京，“成周八师”（又称“东八师”）监视殷商顽民。据《周礼》一师为二千五百人，总数亦不过三万五千。又《诗经》：“绰彼甫田，岁取十千”，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诗经·大雅·荡之什》。

《孟子·滕文公》下。

《左传》昭公十一年。

《逸周书·度邑解》。

《孟子·滕文公》下。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周礼·秋官司寇·司民》。

《史记》卷四《周本纪》。

见金文《禹鼎》、《壶》等铭文。

《周礼·夏官·司马》。

为天子在公田服役的农夫不过万人，以上从侧面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稀少。

《帝王世纪》在说明周公时期的人口为“周之极盛也”之后，续云：“其后七十余岁，天下无事，民弥以息”。既称“民弥以息”，则人口当续有增长，即使年平均增长率为1‰，则七十多年后，人口也会增加近十分之一。说明皇甫谧的记载本身就是矛盾的。古人奉大禹、周公为圣人，出于崇德报功的心理，对其政绩每作过高的称颂，后世学者在儒家的正统观念下，只要是附会在大禹、周公身上的事，即不予也不敢置疑。从西周后期天子有六军，每军一万二千五百人，总计七万五千人，倍于周公之时，也可证实皇甫谧所言的谬误。

西周末期，周宣王邑舅申伯于谢（今河南唐河南），以式南国，而谢土初辟，文物未具，召伯为之平原，彻土田。又封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郑土多草莱，“斩之蓬、蒿、藜、藿”，以事开辟。封韩奕于韩（今山西河津东北），韩土犹未开化，逐土著之貉而从事垦殖。谢、郑、韩地处中原，尚且荒僻如此，至于东方的齐国“地潟卤，人民寡”，农业还很落后，南方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更是“辟开荆山，筇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周宣王时期，由于奴隶逃亡和国人暴动，井田大多变成“维莠骄骄”的荒地。宣王被迫取消每年去千亩原（今山西介休境）举行春耕和秋收的祭天仪式，史称“不籍千亩”。又宣王三十九年（前789年）在千亩原败于姜戎，“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为补充兵源和增加财赋收入而进行了我国历史上见于记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仲山父谏阻说：“民不可料也……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耽心因成丁逃亡严重，一旦调查出来，将在诸侯面前暴露了周王的虚弱。从“不籍千亩”和“民不可料”，直接反映了处于深刻危机中的西周王朝末期，国家在籍人口的稀少。

二、春秋至战国时期人口发展的转折

1. 春秋时期仍是“土旷民稀”

公元前770年进入诸侯分裂割据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莫不将增加人口作为第一要务。孔子说：“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提倡施仁政于民，“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管子主张“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墨子将二十而娶，十五而嫁视为“圣王之法”。为广招徕，

《诗经·小雅·甫田》。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左传》昭公十六年。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左传》昭公十二年。

《国语·周语上》。

《国语·周语上》。

《国语·周语上》。

《礼记·杂记下》。

《论语·子路》。

《国语·齐语》。

越王勾践对“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

但春秋时期大国争霸给各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中原地区的小国负担更为沉重。如周灵王七年（前 565 年）楚伐郑，晋师来救，处于两大之间的郑国，只得“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每次会盟之后，各国都要向称霸的大国进行贡献，“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每贡献一次，用车百辆，千人护送，以致“民力雕尽”、“劳疲死转”、“道殣相望”。直接因战争而付出的代价更为沉重。如周定王十三年（前 594 年）楚围宋时，造成“易子而食，折骸以爨”的惨剧。使社会生产遭到破坏和阻碍了人口的发展。

从城邑的规模来看，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周平王四十九年（前 722 年），郑大夫祭仲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按雉高一丈，长三丈，百雉当为三百丈，正与前说相符。周惠王十七年（前 660 年），卫国（今河南濮阳南）破于狄，“卫之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加上共（今河南辉县）、滕（今山东滕县西南）两地也只有五千人。卫是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孔子一次偕弟子冉有去卫，见其人口众多，不禁赞叹道：“庶矣哉”⁽¹¹⁾，为数尚且如此稀少，其他诸侯国也就不难想见。

《帝王世纪》记载：“平王东迁，三十余载，至齐桓公二年，周庄王之十三年（前 684 年），五千里内，非天王九侯之御，自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人”⁽¹²⁾。《通典》记载略同⁽¹³⁾。按自平王东迁，王畿所在仅及今河南省西部跨大河南地方六百里。王畿以外的诸侯国各自为政，周王室又怎能对五千里内“世子公侯以下至于庶民”进行如此规模的人口普查呢？其说也同样不可为据。

春秋时常以兵车若干乘作为国家大小的标志。据《司马法》，兵车一乘，马四匹，甲士十人，步兵二十人。每兵车五乘有辎重车一乘，后勤兵二十五人。前述卫国被狄攻破时有兵车三十乘，全国五千人约每五人中有一人服兵役。依此类推，大的诸侯国即千乘之国，人口约在 17 万左右，最大的晋国兵车四千乘，人口也不超过 70 万。春秋后期各诸侯国估计共有兵车二万五千乘，则有士兵 87.5 万，总人口约 450 万左右，仅及皇甫谧所云 38%。

春秋晚期在诸侯国“广土众民”的政策下，人口当有所增加，这从各国新修了一些大的城池一事，也可得到反映。郑国的京、栎，宋国的萧、毫，齐国的渠丘，卫国的蒲、戚等城，对各诸侯国来说，甚至形成“未大必折、

《墨子·节用上》。

《国语·楚语上》。

《左传》襄公八年。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左传》宣公十五年。

《战国策·赵策》。

《左传》隐公元年。

《左传》闵公二年。

尚志发：《春秋后期人口新证》（载《求是学刊》1984 年 2 期）一文，也以兵车数为依据推算春秋后期的人口，但因引证史料及计算欠当，得出七千万至一亿人口的惊人数字，比皇甫谧还要夸大四至七倍，其说更不足取。

尾大不掉”，而有“害于国”的威胁，但“土旷民稀”的根本局面仍未改变。如宋（今河南商丘）、郑（今河南新郑）两国之间，仍有大片空地，约当今河南杞县、通许与陈留镇的三角地区，周敬王三十七年（前483年），郑国子产与宋国相约“勿有是”。次年郑战败宋，仍“以六邑为虚”。说明当时人口稀少，双方均感劳力缺乏而听任其荒废。宋、郑等中原地区的重要国家尚且如此，其他国家更可想而知了。

2. 战国时期人口的急剧上升

我国先秦时期的人口，到战国时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飞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区开发与居民点的密布

战国时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铁器牛耕在农业上的广泛使用，既促进了农田的大量开垦，又提高了耕作技术，社会经济大大发展，使春秋时期原散于各国之间的“隙地”，陆续得到开发。大小城邑和新的居民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三里之城，七里之廓”比比皆是。时齐国已是“邻邑相望”，“鸡鸣狗吠之声相闻，而达乎四境”；魏国则“庐田庑舍，曾无刍牧牛马之地。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休，已无异于三军之众”。又齐国孟尝君封于薛（今山东微山东北），有户六万；秦吕不韦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有“家僮（奴仆）万人”，“食客三千”。从封地户口之众，也反映了当时人口的稠密。

（2）都、邑的兴起与繁荣

战国时期各国都城的规模很大，齐都“临淄之中七万户”，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反映了封建社会早期城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的繁华景象。据考古发掘，当时临淄由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二十公里，小城周五公里，“面朝后市”，规模宏伟。赵都邯郸、韩都郑、燕下都武阳等几座战国古都遗址，也颇具规模，都有手工业作坊和市场，反映了战国时期大城市“百工居肆”、商业繁盛的面貌。其他见于记载的如楚都郢“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魏都大梁、宋都睢阳、楚都陈及寿春均因鸿沟水系的开凿，成为重要的经济都会而被定为国都。卫都濮阳因地处濮水之北，交通便利，为三晋及齐货物的

《左传》昭公十一年。

《左传》哀公十二年。杜注：“俱弃之”。

《左传》哀公十三年。杜注：“空虚之，各不有”。

《战国策·赵策》。

《孟子·公孙丑下》。

《庄子·胠篋》。

《孟子·公孙丑上》。

《战国策·魏策》。

《史记》卷七五《孟尝君传》。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传》。

《战国策·齐策》。

《论语·子张》。

《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桓谭：《新论》。

集散地，而成为人口集中的繁荣城市。

其他还有许多大商业城市的兴起，如燕之涿、蓟，魏之温、轵，韩之荥阳，楚之宛，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指成周洛阳、东周巩二城）等，无不“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其中宛是著名的冶铁手工业和繁荣的商业城市，至东汉时人口冠于全国。又宋的陶邑地当菏、济之交，“诸侯四通”，成为“货物所交易”的“天下之中”，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人口众多，到西汉时以定陶为中心的济阴郡，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一个郡。

（3）兼并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相互争雄，征战频仍。初期战争的规模一般不超过几万人，如周显王五年（前364年），魏军在石门（今陕西三原）之役败于秦，被歼六万人。到中期，则一次战役投入的兵力常达数十万。如周赧王二十二年（前293年）秦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一役，消灭韩、魏联军二十四万人；五十五年（前260年）的长平（今山西高平）之战，秦、赵、韩三国动员兵力更在百万以上，秦将白起生俘并全部坑死赵军达四十万之众。战争的方式也由车阵和正面冲击战发展为大规模的车、步、骑兵混合的运动战。大国之间兼并战争的规模，反映了战国后期人口迅速增长的程度。

（4）先秦诸子人口思想的演变

战国前期，先秦诸子提出了许多发展人口的主张。如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孟子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把蕃衍后代看作是人们“奉先思孝”的首要前提，要求成年男女及时婚配，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荀子也强调：“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各国统治者对人口增殖极为重视，秦商鞅公然以邻为壑，“徠三晋之民”，魏国不得不颁布“奔命律”及“户律”以进行抵制。魏惠王并以“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而深为忧虑。但此时对人口增长的论述，已不同于春秋时期。由于人口的繁衍，商鞅在提倡增加人口时，已指出人口与土地必须保持平衡的问题：“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主张“民胜其地者，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徠”。他并提出保持人口与土地二者平衡的比例：“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并称之为“制土分民之律”。

到了战国后期，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韩非，云及当代人口时，谓古者“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祖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桓宽：《盐铁论·通有》。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孟子·尽心下》。

《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致士》。

《商君书·徠民》。

《孟子·梁惠王上》。

《商君书·算地》。

《商君书·徠民》。

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所在的韩国，战国早期即已“地狭而民众”，“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到了韩非生活的时代，人口与土地不平衡的情况更为突出，因而他一反以前思想家因人口稀少而鼓吹人口增殖的常态，为人多而深感忧虑。从商鞅开始提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必须保持平衡，至韩非主张人口的增长不得大于财货的增长，这些思想正是在战国时期人口大量增长的背景下产生的。

《帝王世纪》根据《战国策》记载的戎卒数推论战国时人口云：“考苏、张之说，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存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通典》亦沿袭其说谓：“戎卒尚逾五百余万，推人口数尚当千余万”，惟将“存”字易为“逾”字。战国时纵横家对各国兵力的论述，飞短流长，本不足信。苏秦初欲连横，对秦惠王说：“大王之国，……战车万乘，奋击百万”，当着秦王的面，对秦国兵力的描述竟如此夸张。当“秦弗用，故东合纵”后，他又在说魏时夸大其词，言魏有“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而张仪为秦连横说魏王时，则谓：“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人”，不及苏说之半。同一个张仪在上书秦惠王时说：“今秦地形，断长续短，方数千里，名师数百万”。由“奋击百万”一下子又增加到“名师数百万”，其夸张程度更过于苏秦。皇甫谧以苏、张的外交辞令作为依据，其本身就是不可靠的。而所称人口数仅倍于戎卒数，即两人中就有一人服兵役，则又有悖常理。其对战国人口所作“尚当千余万”的推论显然偏低了。

梁启超在《中国史上人口之统计》一文中，亦以苏张之说为据，其对战国人口的估算，却走上另一个极端。他估计“七雄所养兵当合七百万内外”，并推论说：“由兵数以算户数。据苏秦说齐王云，临淄七万户，户三男子，则临淄之卒，可得二十一万。是当时之制，大率每一户出卒三人，则七国之众，当合二百五十余万户也。由户数以算人数。据孟子屡言八口之家，是每户以八人为中数，则二百五十余万户，应得二千余万人也。此专以七雄推算者，当时尚有宋、卫、中山、东西周、泗上小侯及蜀、闽、粤等，不在此数，以此约之，当周末时，人口应不下三千万”。按苏秦说齐时谓：“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所谓“下户三男子”，当包括老幼在内，自不能完全作为应役的成丁计算。又我国历代人口每户平均数大体上在五口左右，梁氏以八口计，从而得出战国人口已有三千万的推论，又显然偏高。

范文澜“按五人出一兵”及“每户平均五人”推算，认为“七国人口总

《韩非子·五蠹》。

《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帝王世纪》。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战国策·秦策》。

《战国策·叙》。

《战国策·魏策》。

《战国策·魏策》。

《战国策·秦策》。

梁启超：《饮冰室文集》之十。

《战国策·齐策》。

数约计当在二千万左右” ，其估计当比较接近于实际。

三、对先秦时期人口的总估计

皇甫谧《帝王世纪》有关先秦时期的人口记录，从早期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到封建制初期战国，长达一千八百年期间，始终停留在一千余万人的水平上，其乖谬失实，不言而喻。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 1.5‰。建立在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及强制性劳动基础上的奴隶社会，其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倘为前者之半，即 0.75‰。前述春秋后期 450 万人，则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王朝初期为 135 万人，恰好是《帝王世纪》所载夏禹时 1355 万余人的十分之一。以此类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朝初期为 196 万人，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期为 285 万人。这一推算出来的人口数字，比较符合于我国延续达十六个世纪之久的奴隶社会，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和国家政治力量所能控制的范围还很小的情况下，人口缓慢增长的基本情势。

战国时期完成了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过渡，铁制工具的普遍运用，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出现了与春秋时期迥然不同的景象：从“千家之城”到“万家之邑”；“土旷民稀”到“邻邑相望”；“地潟卤、人民寡”到“地狭民众”；“地有余而力不足”到“其土不足以生其民”。再加上新兴的地主阶级，通过变法运动对旧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如秦国商鞅变法建立严密的人口上计制度，规定“竟（境）内仓、口之数”按时上计，使“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国家在籍人口由春秋后期 450 万猛增至 2,000 万。两个半世纪间增加了 3.4 倍，年平均增长率与前述封建社会的 1.5‰正不谋而合。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境内除周边地区少数民族外，已有同族同文化如此庞大的人口，这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它成为以后秦汉统一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建立的基础。

四、秦王朝的人口

1. 秦代的人口统计

秦王朝在统一以前，即已有了比较完善的普查人口的上计制度。为征发徭役的需要，秦始皇十六年（前 231 年）“初龄男子书年”，即将男子的年龄正式列为户口登记的内容。二十六年（前 221 年）秦灭六国，结束了封建诸侯的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实行统一的地方行政区划——郡县制度后，全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页 199。

据《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三，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人口为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四千八百二十八，系二千多年前战国末期（前 221 年）二千万人的 20.6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5‰。

《商君书·去强》。

《商君书·境内》。

战国末（前 221 年）二千万人为一千八百年前夏朝初期（前 21 世纪）一百三十五万人的 14.8 倍，年平均增长率为 1.5‰。

据《秦会要》卷一六《徭役》秦制民二十三岁即开始服役。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国四十多个郡守都直接听命于中央，更具备了当时进一步实施全国性人口调查和统计的条件和基础。上计制度当肯定已推广及于全国。

历史记载也证实了秦时已有全国户口资料。刘邦入咸阳时，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于是刘邦“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萧何并造石渠阁以收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以后在楚汉之争中，萧何以丞相身份留守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即利用秦时留下的郡县户籍，征发士卒、粮饷。又高祖六年（前201年），南过原燕国南陲曲逆县（今河北保定西南旧完县）时，“顾问御史：曲逆户口几何？对曰：始秦时三万余户……”，御史能奏知秦时户口，都是明证。

萧何所收秦图籍，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时还有所称引，西晋初司空裴秀（224—271年）曾说：“今秘书既无古之地图，又无萧何所得”，说明萧何所收秦图籍，可能在东汉末时亡佚，秦时人口数字因以失传。

2. 对秦代人口的推测

《帝王世纪》论及秦初人口时称：“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同书推论战国人口“尚当千余万”，则秦统一时人口损伤三分之二，岂不已降至四百万以下，又哪来的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呢？

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自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至始皇十三年（前234年）的七十八年间，秦破六国兵所斩首虏，见于记载的计百二十余万人，其间长平之战一役，赵国俘虏被秦将白起活埋的即达四十万人。秦军在这次战役中也死亡过半。如果加上秦军为六国所杀的全部人数，以及始皇十三年至秦统一的十三年间彼此伤亡的数字，因战争而直接损耗的人数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占战国总人口两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帝王世纪》所谓“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显然是过甚其辞了。

《帝王世纪》在论及秦始皇大事征役时又谓：“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除这几项工程本身服役的人数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外，人民为输送粮草而“飞刍輓粟”的“转输”负担也不胜其苦，往往是“戍者死于边，输者殍于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在“一罗屯戍，一岁力役”的情况下，每年征发的徭役估计在三百万人以上。秦王朝向人民征收赋税，时人形容其横征暴敛为“头会箕敛”，即按人头收税，以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再加上秦王朝的刑罚又极为残酷，“夷三族”、“诛九族”，以致“赭衣塞路，圜

《汉书》卷三九《萧何传》。

《三辅黄图》卷六。

《史记》卷五三《萧相国世家》。

《汉书》卷四十《陈平传》。

《晋书》卷三五《裴秀传》。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汉书》卷六四上《严安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圖成市”。说明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已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除滥发徭役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外，人口的自然增殖率也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负增长。

但是《帝王世纪》对秦代人口的叙述，只强调了秦统治者的暴政，及其大事征役的一面，事实上，要正确估计秦代人口的状况，还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

秦始皇平定百越，使其统治达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等地。蒙恬征匈奴，夺回河南地及河套以北阴山一带，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筲（川西南）、夔（滇东北）、夜郎（滇东）、滇（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嵩、昆明（洱海及其附近地区）等的内附，使秦王朝的领土，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范围，在这一比战国远为辽阔的土地上，人口也必然相应有所增加。

（2）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即允许百姓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国家正式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的私有权，这就提高了个体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秦王朝统一全国货币、度量衡、文字及广修驰道，大大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迁徙富豪及徙民实边的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如灭赵后迁当地富豪于临邛（今四川邛崃），使临邛发展成为新的冶铁业中心和新兴的商业城市。破魏后迁富豪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孔氏迁南阳后，继续经营冶铁业，“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以致“家致富数千金”，促进了南阳冶铁业的发展。至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倘以每户五口计，当为六十万人，原居住的人口尚不在内，使咸阳成为富商大贾麇集的全国的商业中心。秦王朝徙民实边的人数如包括派往边境长期戍守的戍卒在内，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这一实边性质的移民，也大大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及人口的增殖。

（3）秦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秦代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新的发展，《淮南子·汜论训》有“为之耒耜耜”一语，“耜”为用于平土的无齿耜，“耜”是一种除草的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在手工业上，秦代打破了战国时期城市手工业技术的地方封锁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已专设“铁官”管理冶铁事业，在集中控制下各地冶铁技术因得到彼此沟通而大大提高了。秦始皇“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可见咸阳冶铜和铸铜工场规模之大。《史记·货殖列传》谓：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价”，说明当时丝织业生产的普及并已作为商品输出，秦始皇对以贩卖织物而致富的乌氏倮，则“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以至“礼抗万乘，名显天下”。

《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司马迁的高祖司马昌曾任“秦主铁官”。

[唐]袁郊《三辅旧事》。

秦统一六国消除了封区界线的障碍，商品经济大大地发展了。由于市场扩大，商路四通，不仅使许多旧的都市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并出现了象丽邑（今陕西临潼东）、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临邛等许多新兴的都市。

秦王朝所实行的以上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制度，适应当时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形势，开创了使封建的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向前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秦始皇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上，因而社会生产力和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与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秦始皇正是凭借他亲手缔造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力量，得以实现他穷侈极欲，好大喜功的野心。他所征发的劳役以三百万计，约占战国总人数两千万人的百分之十五。但服役者大多是在苛暴刑法下的“罪人”，在形式上仍不发间左服役。秦始皇在《琅邪刻石辞》中吹嘘“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在《碣石刻石辞》中，并以“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而自炫，说明当时人力还是有相当潜力的。到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虽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但如将被迫“逃亡山林，转为盗贼”的流亡人民估计在内，秦末全国人口数字仍不会少于战国盛时。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第二节 两汉人口大发展时期

一、西汉人口发展的三个阶段

西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发展的时期，也是见于历史文献最早并比较有准确的户口统计数字的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平帝元始二年（公元二年）的全国户口统计数，但在整个西汉时期的人口曾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 汉初至武帝元光初年（前 206—前 134 年）人口急剧上升时期

（1）汉初人口的减耗

继秦代的苛政、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战争的多年战乱，以及自然灾害的频仍，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汉高祖六年（前 201 年），萧何封酈侯八千户，宣曲侯最少仅六百七十户，曹参封平阳侯户数最多，亦不过一万零六百。较秦时吕不韦封侯十万户，仅及十分之一。人口之萧条，于此可见。

前面提到的高祖询问曲逆户口，御史奏以“始秦时三万余户，间者兵数起，多亡匿，今见五千余户”，亡匿人数达六分之五。《汉书》无汉初户口记录，根据“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的记载，说明汉初因战乱及自然灾害而逃亡异乡，已是极普遍的现象。

《帝王世纪》论及汉初人口时说：“至汉祖定天下，民之死伤，亦数百万，是以平城之卒，不过三十万，方之六国，五损其二”，该书推断战国时人口为千余万，“五损其二”，则汉初人口仅存六百万。杜佑《通典》因袭其说，但改为“方之六国，十分之三”。梁启超则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表》所载秦汉之际人民伤亡情况，更提出“方之六国，不及二十分之一矣”，汉初人口被越说越少了。

皇甫谧以汉高祖用于平城的兵力来推断汉初人口，本身就是错误的，高祖七年（前 200 年）的平城之役发生于六年（前 201 年）分封诸侯之后，其时汉廷直接统治的地区仅十几个郡，不可能动用全国的兵力，且高祖在立国之初即下令“兵皆罢归家”，军队已有不少复员，解甲归田，参加平城之役的 32 万步兵，已不足以作为推论汉初人口的依据。事实上，在人口损失过半中，如将战乱中大量逃亡脱籍的人数估算在内，则汉初实际人口估计当在 1,500 万至 1,800 万之间。

（2）西汉前期人口的急剧上升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汉书》卷四《陈平传》。

《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续汉书·郡国志》一，刘昭注引。

《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梁启超：《中国历史上人口之统计》，《饮冰室文集》十。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初社会经济的残破局面，据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钧駟（由颜色相同的四匹马拉的车），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为了恢复生产以维持并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以汉高祖刘邦为首的西汉统治者，被迫采取了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第一，恢复农业生产秩序首先，解兵归农，组织军队复员，“兵皆罢归家”，并“以有功劳行田宅”，军吏士卒无爵或爵在大夫以下的，一律进爵为大夫，给予土地使成为自耕农，从事农业生产，并免除其徭役；战争期间，“聚保山泽，不书民数”的人民“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轻田租，什伍而税一”等，由是“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于田亩”。使农民重新与土地结合起来。政府所控制下的在籍人数也就大大增加了。

第二，推行早婚，奖励生育汉高祖七年（前200年）下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惠帝六年（前189年）又下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西汉政府还以户口是否增加作为对地方官政绩考核的主要依据，如南阳太守召信臣因“户口增倍”而升迁河南太守，即是一例。

第三，加强户口管理西汉称户籍曰“名数”，当时登录“名数”主要依靠严密的基层组织，即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一里，十里为一亭，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秩、嗇夫和游徼，分别掌管全乡的教化、户口、诉讼、赋役和禁盗贼；在县和道并专设户曹管理户籍和统计人口，每岁“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然后汇总“岁尽遣使上计”。

文、景时期（前180—前141年），继续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劝课农桑”和实行“轻徭薄赋”。文帝十三年（前167年）下诏“除田之租税”，免收天下农田租税十二年。丁男徭役减为“三年而一事”，算赋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颁布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等。景帝二年（前155年），“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通过提倡农业，减免徭赋，农民负担减轻，社会相对安定，农业生产大大发展，“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羨”。

《史记》卷三 《平准书》。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书》卷二四《食货志》。

《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汉书》卷二《惠帝纪》。

《汉书》卷八九《召信臣传》。

《续汉书·礼仪志》。

《续汉书·百官志》。

《汉书》卷四《文帝纪》。

《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汉书》卷五《景帝纪》。

《太平御览》卷三五时序部、卷八三七百谷部引桓谭《新论》。